

# 窑址采集红绿彩标本 及红绿彩瓷对比研究

□ 刘 伟

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我院陶瓷工作者赴全国各地古窑址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,共计5万余片。这些资料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近180余个窑口,其时代上起商周下至清代,贯穿整个陶瓷发展历史,发展脉络极其清晰。其中以唐代到元代的窑址标本最为丰富,有些标本可与出土或传世器物相印证,它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古代各地瓷窑烧造状况,充分补充了文献记载与传世器物研究的不足。目前全国各地许多窑址已遭严重破坏,或因自然原因深埋于地下,再前往采集几乎不可能再有所收获,故我院所藏这批古窑址瓷片标本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<sup>[1]</sup>。

建国后人们对红绿彩瓷器认识,是从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先生的《宋代北方民间陶瓷》一书开始<sup>[2]</sup>。关于红绿彩瓷器,在故宫窑址调查的这批瓷片中有一定数量,李辉柄先生在《磁州窑调查》一文中,也曾提到过故宫早期调查采集到的一些红绿彩标本<sup>[3]</sup>。对于我院近年来收藏的这批红绿彩标本,本文将通

过与院藏完整器物,及各地出土器物进行比较研究,试图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过程,进一步探讨它所形成的社会因素。

## 一、窑址调查中的红绿彩瓷器标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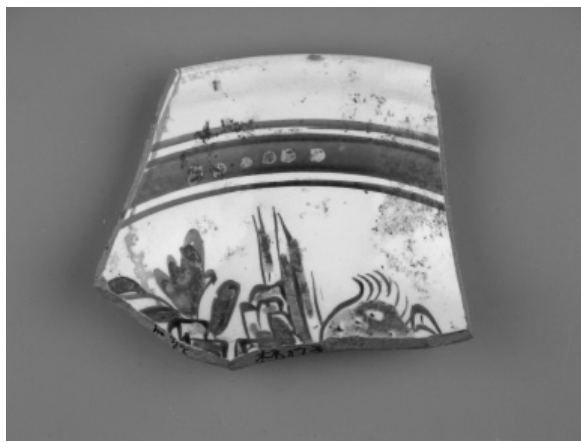
红绿彩瓷器在宋、金时期,不仅是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等地瓷窑烧造的品种之一<sup>[4]</sup>,也是这些地区居住遗址中<sup>[5]</sup>独具特色的遗留物。它的出现使陶瓷从单一的胎釉装饰,向丰富多彩的彩绘装饰迈出了一大步。从目前采集到的标本看,红绿彩瓷器造型以小件雕塑、枕、碗、盘类为主,其红绿彩花纹与白色釉面形成的强烈对比,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<sup>[6]</sup>,特别是雕塑类品种丰富多彩的造型,更形成北方瓷窑鲜明时代特色。

### 1. 河北磁州窑

磁州窑是我国北方民间著名瓷窑之一,其兴盛期历经宋、金、元、明等几朝代。其中心窑场位于磁县的观台镇、东艾口、冶子村及彭城镇等地,窑址范围广大,遗存物丰富。其中红绿彩装饰的标本早在1964年4月的调查中就有发现<sup>[7]</sup>,在故宫采集的磁州窑标本中以雕塑器为主,盘、碗的数量较少(图一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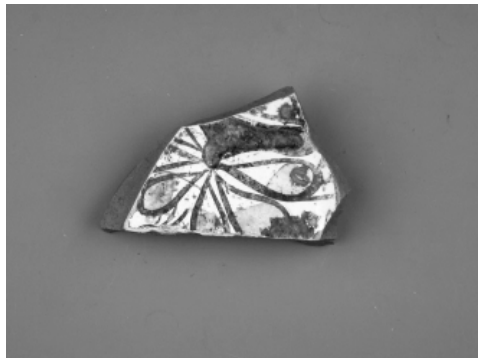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 磁州窑红绿彩人物



图二 磁州窑红绿彩碗



图三 鲁山窑红绿彩碗



图四 鲁山窑红绿彩碗

图二)。

## 2. 河南省各瓷窑

河南是我国北方地区瓷器烧制中心,省内瓷窑遗址发现较多,主要集中在豫中和豫北地区,全省共有20余个县市发现古陶瓷窑址,少的地区发现两 three处,多的达十几处。特别是禹县、新安县境内,瓷窑遗址密集,两县都发现窑址100余处<sup>[9]</sup>。红绿彩瓷器在故宫早期窑址调查标本中占有较大比例,特别是鲁山窑、扒村窑,采集标本较多,虽然器物比较小,但具有典型性。

河南鲁山窑。窑址在河南省鲁山县段店。该窑早在唐代就已烧造黑釉带花斑的器物,证实了唐人南卓《羯鼓录》中所记载的“鲁山花瓷”<sup>[9]</sup>,也解决了传世花瓷腰鼓的确切窑口问题。到了宋代该窑烧制数量及品种有较大发展,在故宫采集的标本中,鲁山窑红绿彩标本是颇具特色的品种(图三、图四)。

禹县扒村窑。窑址在河南省禹县(今禹州市)扒村,主要品种以白地黑花瓷为主。在故宫采集的红绿彩标本中,有碗、雕像、枕等残器(图五、图六)。

## 3. 山西省长治窑

窑址在山西省长治县八义镇,主要是金代瓷窑<sup>[10]</sup>。以烧红绿彩碗、塑像为主,兼烧少量白地黑花器物。这些红绿彩碗,里心、圈足上都有五个支烧痕,纹饰以花卉为主,另有少量鱼纹及题写诗句纹饰(图七、图八)。

从故宫博物院早期调查的红绿彩标本初步观察,我国北方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广大地区,红绿彩的烧制其品种主要是民用器,以碗及各式小雕像为主,纹饰主要有花卉、诗句,其时代通过器物类比,基本上属于金代器物。

## 二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红绿彩传世器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红绿彩传世器,从目前看没有清宫旧藏器物,其文物来源主要是解放以后的收购和个人捐献,品类以人偶雕塑为主,其中包括孙瀛



图五 扒村红绿彩



图六 扒村红绿彩



图七 长治窑红绿彩雕塑

洲先生捐献的“红绿彩人像”。这些器物在故宫原始登记帐中,名称为“宋加彩…”、“瓷加彩…” ,有些虽然称作“红绿彩…” ,但时代统一定为宋。按照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研究看,有些时代应该改为金或元。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其时代当时确定正确与否,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自解放以来,对红绿彩的认知与研究过程。

故宫馆藏一批红绿彩雕塑,有元代器物,大部分应该属于金代器物。

### 三、关于红绿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
从故宫博物院窑址调查标本和馆藏文物看,我

们认为红绿彩发生、发展的过程,宋代应该是初创阶段,金代是其繁荣发展期,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元代。明清两代虽然景德镇出现了釉上五彩、釉下青花、粉彩等许多彩瓷品种,但红绿彩并没有销声匿迹,在元代以及明末、清初依旧有一个发展期。

#### 1. 关于宋代红绿彩

关于北宋时期红绿彩是否已经出现,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论,北宋墓葬至今也没有出土物,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北宋元丰四年(1081年)红绿彩盖罐<sup>[11]</sup>(图九)。这件器物做工规整,器壁较薄,从造型上看属于宋代工艺,与文字纪年相互对应。它相距金代出现“正隆”、“大定”纪年红绿彩器物的时间大约80~90年(1081~1161年),从而印证了宋代有红绿彩的器物。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宋定窑红彩“长寿酒”碗。宋词中苏轼曾云: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;文献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有“后苑烧朱所,掌烧变朱红,以供丹漆作绘之用,太平兴国三年置”<sup>[12]</sup>的记载,此条记载早于“元丰四年”铭大约100年,它们延续了相互的承袭关系。说明宋代就曾炼制矾红彩,以供漆绘之用,因此,矾红彩在用作颜料的过程中,也极有可能被使用在瓷器上作为装饰之用<sup>[13]</sup>。

许之衡在《饮流斋说瓷》中也有:“瓷之有花,宋代以渐流行,……宋瓷暨有红绿花彩者”<sup>[14]</sup>的记载,这些都可以作为红绿彩瓷器始烧于宋的观点的佐证。

#### 2. 元代红绿彩的延续烧造

红绿彩瓷器出现的时代,早期全部定为宋,随着金代纪年墓和传世纪年墨书器物的不断出现,开始将这些传世器归在金,但是随着考古工作不断进展,元代纪年墓陆续出现一些器物,例如:

1996~1998年元上都遗址南碾子山墓地,出土



图八 长治窑红绿彩碗



图九 “元丰四年”红绿彩盖罐





图一〇 山西汾西元刘用墓出土红绿彩碗



图一一 山西侯马明昌七年墓出土红绿彩碟

一件元红绿彩碗,收藏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<sup>[15]</sup>;

200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区燕家梁元代(1271~1368年)遗址,出土一件元红绿彩人物(卧睡姿势)雕塑,收藏在包头市文物管理处<sup>[16]</sup>;

2004年山西翼城南湾乡源村,元代至正六年(1346年)墓,出土六件红绿彩风帽人俑,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收藏<sup>[17]</sup>;

山西汾西元代至正(1341-1368年)刘用墓,出土一件元红绿彩牡丹花碗,山西博物院收藏<sup>[18]</sup>(图一〇)。

通过与这些元墓出土器相比较,我们可以看出故宫院藏的红绿彩雕塑类器物,其中一部分应该属于元代器物,如山西翼城的红绿彩小人,与故宫藏的风帽小人造型基本相同。

元代器物与金代器物,在工艺制作方面,有一些细微差别。如果拿金代纪年墓葬出土的器物,如峰峰窖藏中的文殊、普贤、如来像,河北崔氏墓出土的雕塑,以及故宫采集标本中的雕塑,对照元代墓葬出土的红绿彩雕塑,从画工上看金代雕塑类器物要比元代精细,红绿彩绘画细部特征明显,特别是人物眼睛表现清楚,体量上也比元代器物大。

### 3. 北方各地红绿彩瓷器外观差异

宋金时期红绿彩瓷器在北方地区开始烧造,由于流行时间较短,虽然从外观上看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地器物,没有太大差别,但是仔细观察,各窑口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。

在北方地区红绿彩瓷器中,以河北磁州窑生产的器物,相对胎体瓷化程度较高,胎体显得比较坚硬。一般呈灰黄色胎,胎体内颗粒虽然粗一些,但施化妆土后由于烧成温度比较高,化妆土与胎面结合紧密,釉面较亮,色彩比较鲜艳。

河南地区各窑生产的红绿彩,只有扒村窑与修武当阳峪窑,感觉胎体较为细腻,其他各窑胎色以黄色为主,视觉感相对软一些,这可能与瓷土结构、胎泥的淘洗程度和烧成温度有关系。胎体化妆土颜色微微发暗,与胎面结合相对松软,红绿彩颜色对比不很鲜亮。

山西地区以长治八义窑红绿彩最有代表性,胎体虽然呈现黄色,并夹杂有白色石质颗粒等黑色杂质,但相对密度高一些。碗类采用五支钉烧造工艺,也是其重要特征。由于二次烧成,温度、颜料的配比,以及保存环境的不同,长治窑红绿彩器有些彩绘剥落严重,有些则保存完好<sup>[19]</sup>,这种现象也是目前传世红绿彩器物中,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从外观上看长治窑的器物的胎质,与磁州窑器物相对接近一些。

### 4. 红绿彩瓷器中色彩构成

通过对故宫博物院窑址采集和传世物的分析研究,红绿彩瓷器上的各种色彩,在使用中有个大致规律,一般情况下红绿彩圆、琢器中,红、绿、黄、黑彩的使用比例,以黑彩为1的情况下,大约为4:2:1:0。在目前我们见到的许多圆琢器彩绘中,主要以红彩为主,辅助使用绿彩,很少使用黄彩,几乎不用黑彩做装饰。

在红绿彩雕塑器的色彩使用中,红、绿、黄、黑彩的使用比例,以黑彩为1的情况下,大约为4:3:2:1。在一些人像的彩绘过程中,人物衣着的主要色调以红彩为主,衣服的边饰以绿彩调配,黄彩用于表现内衣和服饰上的花卉,黑彩则用于表现人物的发髻、眼眉,以及勾勒服饰的丝绦、褶皱、鞋靴,还有人物手拿物件的轮廓线条。这种施彩比例是一种概括总结,不排除比例颠倒的相同现象,以及各别特例,总体使用还是基本按照这个比例施画的。

红绿彩雕塑器中,人物形象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体现,从这点出发,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形象、头饰、服饰、坐姿等分析研究,还可以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状况,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提供详实的实物资料。

#### 5. 红绿彩瓷器的使用功能

目前能够见到的红绿彩器物主要包括:传世品(早期的出土物)、基建工地采集品、窑址采集品、墓葬、遗址发掘品和窖藏出土物等。窖藏器物主要为供养人像、佛像和各类神仙像,如河北峰峰地区的窖藏。工地和生活遗址出土的器物,主要为生活用具和玩具,如收藏在包头市文物管理处200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区燕家梁元代遗址,出土的一件元红绿彩睡卧姿势人物雕塑,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一种情趣,很有代表性。墓葬中的出土物,主要是一些红绿彩碗作为殉葬器。由此看来,金元时期的红绿彩器物的用途,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类、佛教造像以及殉葬器皿。

#### 四、红绿彩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

红绿彩瓷器在金代达到繁荣期,有其深刻历史背景。从金代(女真族)历史发展看,金在公元1127年灭北宋后,就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,它统治中国半壁河山达百年之久。特别是当金代统治者迁都开封后,其政权在中原得到进一步巩固,这时作为主要手工业的陶瓷业,也因此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。实际上北方地区磁州窑、定窑和钧窑等著名瓷窑,其瓷窑类型的最终形成是在金代,其产品在金代与北宋时期同样处于艺术发展的顶峰,在继承的基础上,部分产品甚至超过了北宋。

##### 1. 溯源历史看女真族对色彩的追求

金代瓷器虽然是沿袭北宋制瓷业发展而来,但女真族对色彩和纹饰的追求,必然深刻影响到其发展,换句话说金代红绿彩的出现,如同清代满族人进关以后,对粉彩瓷器的追求一样。

以磁州窑器物为例,北宋时期磁州窑以剔、刻、划花为代表的装饰技法,在金代开始衰落,取而代之的是金代大量流行的白地绘黑花技法,也即外国学者称之为“磁州窑型”的技法。一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题“金大定二年”款磁州窑枕,堪称为金代磁州窑瓷器中的珍品。此枕呈虎形状,虎口微微半合,双目圆睁,正是虎视眈眈、咄咄逼人之态。虎背为枕面,其上绘画一只鹳鸰鸟,悠然自得地在水边作回首观望状,远处天空上两只大雁自由飞翔,近处几丛水

草疏疏朗朗。画面构图虽着墨不多,但生趣盎然,寥寥几笔就把鹳鸰在瞬间的动态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传世的古代绘画作品中,宋、金时期的名作存世不多,但这件虎枕上所绘画的图画,堪称一幅绝妙的绘画作品。虽然其画风不能与宋代格调高雅的院体画、工笔画相提并论,但其别具一格的画风,简洁明快的构图,潇洒自如的笔法,以及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黑白两色,为典型的北方民俗画作品,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殊艺术魅力,同时这件虎形枕,也反映出金代女真族与南宋宫廷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。

金代定窑与磁州窑发展一样,其窑址虽仍在北宋时期的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及燕山一带,所制定瓷胎质依旧细白,釉色光润,呈乳白色光泽,但其装饰技法,一改宋代以刻划花纹为主的若隐若现风格,以模印花纹为主,构图更加鲜明,纹饰更加丰富多彩,如常见的双鱼、荷花、回纹等尤具时代特色,均可称为北宋定瓷的继续和发展。

金代耀州窑也还在陕西铜川黄堡镇一带继续烧



图一二 河北崔氏墓出土红绿彩小人像



造,虽然金代耀瓷的釉色呈现一种姜黄色,釉面薄而不润,装饰技法也不如宋瓷丰富多样,但其更趋向简洁明了的构图,特别是模印婴戏牡丹、犀牛望月等纹饰,具有强烈生活气息。至于钧窑虽然在宋、辽、金三方对峙时,因战事频繁窑场曾一度荒废,但当战事稍息后,当地民众便迅速重建窑业。金代钧瓷的产地也不仅仅局限在河南禹县一地,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内蒙等地许多窑场,都烧制钧釉那种天蓝釉带红斑的品种,其风格鲜明可见。

金代北方地区窑业发展,充分反映了金代女真民族,与关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陶瓷文化之间,虽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,但其特有的民族审美倾向,使金代制瓷业有别于其他各个历史时期,它为红绿彩瓷器的出现,提供了历史必然。

## 2. 金代红绿彩繁荣的社会原因

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,一些带有纪年铭文的金代红绿彩瓷器不断出现:

河南鹤壁博物馆 1979 年发掘鹤壁集窑址时,发现了一些“大定九年”纪年铭红绿彩器<sup>[20]</sup>;

1964 年山西侯马地区在“明昌七年”纪年墓中<sup>[21]</sup>,也发现红绿彩盘形器;

河北峰峰矿区崔仙奴泰和三年(1203 年)墓,出土一件红绿彩仰卧童子像,两件站立童子像(图一二),四件坐鼓童子像,一件骑鼓童子像,现藏于河北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<sup>[22]</sup>;

山东成武房基遗址,出土泰和三年(1203 年)红绿彩一件男坐像,一件女坐像,一件女立像<sup>[23]</sup>;

2004 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房屋遗址,出土一件红绿彩文官雕塑,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藏<sup>[24]</sup>;

1972 年河北峰峰矿区窖藏,出土一尊高 61.5 厘米红绿彩如来佛像,一尊高 42.6 厘米红绿彩文殊菩萨像(图一三),一尊高 41 厘米红绿彩普贤菩萨像,这三件雕像为河北磁州临水窑烧造<sup>[25]</sup>。

1974 年河南省禹州市钧台遗址,出土一个高 21 厘米红绿彩戏莲坐绣墩童子像,河南省文物考古收藏<sup>[26]</sup>。这件器物与河北峰峰崔仙奴墓出土的人像,从造型、发式,到装饰技法相似,相互即可以印证时代的同一性,同时也能区别扒村窑和磁州窑的工艺上的差异。

在日本也曾发现一件芦雁纹红绿彩碗,底墨书“泰和元年”(1201 年)<sup>[27]</sup>;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一件红绿彩碗,底墨书“泰和元年”<sup>[28]</sup>。



图一三 河北峰峰窖藏文殊像

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金代社会这些带纪年铭的红绿彩器物,主要出现在正隆(海陵王)、大定(世宗)、明昌、泰和(章宗)、大安(卫绍王)这段时期(1156—1211 年)。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,它是金代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,社会相对安定,民生逐渐富庶的具体表现。公元 1189 年金章宗继位,在位期间他继承了世宗的治国方针,继续推行汉化政策,提倡学习汉族文化,鼓励女真族和汉族之间通婚,促进了民族之间相互融合,宋金之间相对和平状态也得以维持,北方地区社会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。世宗、章宗时期是金朝历史的兴盛时期,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大定明昌之治”,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所称赞。金代著名学者元好问<sup>[29]</sup>称:“历大定、明昌、泰和,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。”金朝著名文学、理学家赵秉文也曾曰:“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。”<sup>[30]</sup>由此看来,在这段时期瓷器上以红绿彩进行装饰,或许是对这种短暂太平盛世的一种赞誉。

金代红绿彩瓷的大量出现,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安定生活的向往;另一方面也是金代女真族对他们审美观念的一种诠释。特别是金代当海陵王迁都

燕京后,稳定的社会体制,促使其延续和兴盛了这种追求华丽色彩之风<sup>[3]</sup>。而后世之人之所以将红绿彩这种装饰归于宋代,是因为当时的研究者对金人入主中原这一历史现象的回避,又由于没有详实的考古资料对其进行解释,造成了很长一段时期,对金代制瓷业所取得的成就无人问津,乃至将金代辉煌的红绿彩瓷器埋没。

综上所述,红绿彩瓷器是中国陶瓷历史研究中的一朵奇葩,它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审美理念,和欣赏趋向的转变,是中原民族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红绿彩瓷器由于制作地域的不同,地域原料的差异,以及工艺上的种种区别,形成了风格看似相近,内在迥异的现象,虽然目前尚不能完全区别其窑口,但是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,考古发现经验的积累,以及对传世器物的有效排比,应该能够对其烧造窑口进行相对准确划分,以及时代上的区别。此外,通过历史上民族关系研究,也有助于我们在了解金代女真族的审美基础上,帮助我们认清当时的风俗习惯,重点突破性研究宋代红绿彩的出现,重新认识金代红绿彩瓷器乃至元代的红绿彩瓷器。

[1] 故宫博物院编(冯先铭 李辉柄主编)《中国古代窑址标本—河北卷》,紫禁城出版社,2006年5月版。

[2] 陈万里《宋代北方民间陶瓷》,朝花美术出版社,1955年版。

[3][7] 李辉柄《磁州窑遗址调查》,《文物》1964年第8期。

[4]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8年第6期。鹤壁市博物馆《河南鹤壁集瓷窑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》,转载《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4年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《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》,《文物季刊》1998年第3期。焦作市文物工作队《河南省焦作市牛庄瓷窑遗址二号灰坑》,《北方文物》1995年第2期。北京大学考古系编《观台磁州窑址》,文物出版社,1997年版。秦大树,马忠理《论红绿彩瓷器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6期。

[5] 望野《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》,《文物》2006年第2期。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内蒙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河北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
[6][9]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《中国陶瓷史》,文物出版社,1982年9月版。

[8] 故宫博物院编(冯先铭 李辉柄主编)《中国古代窑址标本—河南卷》,紫禁城出版社,2006年5月版。

[10][19][31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《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》,《文物季刊》1998年第3期。

[11] 叶佩兰主编《五彩名瓷》,艺术图书公司,1996年。

[12] 《宋会要辑稿》,职官三六之七六。

[13] 望野《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》,《文物》2006年第2期。

[14] 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卷十(说花卉第五)民国铅印本。

[15][16][24] 张柏主编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内蒙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
[17][18] 张柏主编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山西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
[20] 鹤壁市博物馆《河南鹤壁集瓷窑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》,转载《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4年。

[21] 山西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《侯马102号金墓》,《文物季刊》1997年第4期。冯先铭主编《中国陶瓷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11月。

[22] 《河北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10期。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河北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
[23] 《成武出土金代五彩瓷人》,《文物》1993年第11期。

[25] 张柏主编《中国出土瓷器全集》河北卷,科学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
[26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禹州钧台窑》,大象出版社,2008年5月。

[27] 三上次男《世界陶瓷全集》,小学馆1981年版。20图。

[28] 同上,21图。

[29] 元好问(1190—1257),字裕之,号遗山,世称遗山先生。山西秀容(忻州)人。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(1190年)七月初八,于元宪宗蒙哥七年(1257年)九月初四日,卒于获鹿(在今河北省)寓舍,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(今忻州韩岩村)。

[30] 赵秉文(1159—1232)金朝文学家、理学家。字周巨,号“闲闲老人”,磁州滏阳(今河北磁县)人。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(1185)登进士第,金宣宗兴定元年(1217)拜礼部尚书,兼侍读学士,同修国史、知集贤院事,哀宗即位,改翰林学士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故宫博物院)